

## 壹、問題意識說明

明人王思任於〈李賀詩解序〉中，曾精要地概述李賀詩的特質：

賀既孤憤不遇，而所為嘔心之語，日益高渺，寓今託古，比物徵事，大約言悠悠之輩，何至相嚇乃爾。人命至促，好景盡虛，故以其哀激之思，變為晦澀之調，喜用鬼字、泣字、死字、血字。如此之類，幽冷豁刻，法當天乏。（吳企明，1994，頁200）

李賀成名甚早，時人將他的樂府詩與李益詩相提並論時，大約是15歲。<sup>1</sup>元和四年春，李賀進京赴試，嫉妒其名聲才華的人，以李賀父親名「晉肅」與「進士」音近為由，指其應尊重避名諱的慣例，放棄舉進士。這件事影響深遠，從結果來看，造成李賀尋科舉考試之途入仕干祿的期待被徹底粉碎，這時他才20歲。王思任稱李賀「孤憤不遇」，言其「孤憤」，便多少意味著李賀懷有背離「常世」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，而以此「反常」的態度進行創作。李賀詩好奇詭而求工巧，體物賦詩細膩深刻，又擅長捕捉感官與色彩，此乃其詩具有高度藝術價值之處。但另一方面，李賀詩喜談幽冥神仙之事，擅長營造陰森詭異的意象，又大量書寫對於時間流逝與生命苦短的悲嘆，不免給人留下負面消極的印象。同情李賀的批評家，便欣賞他的藝術造詣，感嘆其懷才不遇而早逝的悲劇；也有從以史證詩的角度讀李賀者，以為字字句句都隱藏了美刺時政、自弔生平的言外之意。非難李賀的批評家，便指稱其詩「牛鬼蛇神太甚」，荒誕無理，不符合詩之雅正中和的美感，難以做為典範。

歷代對李賀詩的批評呈現出兩極評價，其中又以「牛鬼蛇神」的部分爭議最大。<sup>2</sup>

<sup>1</sup> 見《新唐書·列傳第一百二十八·李益傳》：「益故宰相揆族子，於詩尤所長。貞元末，名與宗人賀相埒。每一篇成，樂工爭以賂求取之，被聲歌，供奉天子。」（歐陽修，1974，頁5784）

<sup>2</sup> 根據陳友冰〈李賀鬼神詩的定量分析〉一文之統計，李賀的詩歌，包括作者有疑義的「外集」和「補遺」，共約240首。其中修辭提及鬼神的詩，有91首。又，寫天神的詩有40首，寫鬼的有27首；由此可見「神鬼詩」的確是李賀詩的一大特徵（陳友冰，2004b，頁80-88）。

這些詩比較明顯的共同特徵包括：寫鬼或營造鬼境、弔鬼或揣摩鬼的心理、詩句中帶有冥土意象、寫幻想成分居多的神仙之事，又或是從「神仙也有死」的角度，哀嘆蒼天無情、生命轉瞬即逝。李賀對於「死」與「永恆」的主題極其敏感，而當他凝視著死亡進行創作時，亦鮮少像盛唐詩人般，以曠達來昇華死亡焦慮。另一方面，他自身的坎坷際遇、貧窮多病，都使其生活如同試煉，死亡彷彿就在不遠處。

面對這樣一位「生死意識」鮮明的詩人，傳統的批評方法與觀念出現了缺憾。古代文學批評有其擅長探索的面向。劉若愚（1981）在《中國文學理論》中，將中國傳統批評分類為源自六種文學理論，分別為形上論、決定論、表現論、技巧論、審美論以及實用論。其中，「形上論」是指古代文人創作時，對於「道」的自覺性連結。窄化地說，道可以是特定的某一學家的觀念，但古人顯然更在乎普遍的、形而上的宇宙規律之體悟與具現。這種形上論的經驗，擴及到對社會的體察時，便左右了文人的世界觀以及文學表現的價值觀，於是有了文學「決定論」。前人相信社會之治亂能決定文學之「正」、「變」。而早期的文學表現與「決定論」密切相關，詩人是「以一國心為己心」的人，詩人的文學表現如同社會、時代的鏡子；漢朝之後個體意識興起，遂漸漸有人從材質氣性出發，關注個體之先天與後天特質之於文學表現的差異。最後，「實用論」是將文學視為教化、使倫理和諧的手段，一切的創作最終都必須對道德與社會秩序有所貢獻。

傳統文學理論關注了文學的發生、創作、形式藝術與美感、傳播與效用，經過儒、道二家演繹的「藝術精神」，亦對文學的創作與批評產生長足的影響（徐復觀，1966）。客觀地說，儒家的現世價值觀以及道家的逍遙精神，幾乎主導了上述六類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流變。從唐代到清末對於李賀詩的批評，大致也是源於這帶有儒道特徵的六類文學理論。然而，當批評家面對一位生死意識鮮明、相對不在乎主流詩歌表現方式，並且在日常中不斷以肉身感知迎向死亡焦慮的詩人，他那些備受爭議的「鬼詩」，不論從是否創造了現世價值、修辭技藝的角度，或者從是否展示了超脫存在侷限之精神的角度看，都顯得有未能解明之處。傳統批評方法與觀念的缺憾，來自於讀、解者不習慣從詩歌所反映出的存在處境與心理，正視詩人寄寓其中的生死關懷，特別是存在焦慮的部分。